

大一统宗教与汉家封禅

谢 谦

内容提要 汉代儒学的正统化,为汉王朝统治者建立大一统宗教与礼乐制度提供理论依据。而儒学化的大一统宗教与礼乐制度的建立,标志着发轫于汉初的改德改制运动大功告成,也意味着汉袭秦礼的历史的结束。本文以汉代郊祀、明堂、封禅等宗教祀典及其礼乐制度的发展变化之迹为线索,具体地考察了宗教儒学化与儒学正统化的这一历史过程。

关键词 礼乐制度 郊祀 封禅 汉武帝

汉初诸帝不好儒术,“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1]。除了宗庙之礼外,其它祀典多只为具文,并没有建立起汉王朝统一的宗教与礼乐制度。即使是奉为尊神的五帝之祀,天子也很少亲祭。据《西汉会要》卷九统计,汉初诸帝亲郊有三:文帝两次,景帝一次。至于其它神祠,皆由祠官领之。到了武帝即位,汉王朝的大一统政治已日趋稳定,同姓诸王的势力已被削平,匈奴的威胁也已解除,统治者的注意力自然也就转向了大一统宗教与礼乐制度的建设上。儒学的正统化为制礼作乐以兴太平提供了理论依据。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即向武帝提出了尊儒学为正统、行德教以化天下的建议。但德教的基本形式即儒家所主张的礼乐教化,礼乐不兴,教化也无从谈起。元朔五年,武帝继设立《五经》博士、罢黜百家之学后,又下诏说:

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今礼坏乐崩,朕甚闵焉。故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荐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以怡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2]

这样就把劝学兴礼“以化元元、移风易俗”的儒家理想制度化了。尽管统治者事实上并非“纯任德教”,而是“以霸王道杂之”^[3],但以儒学为正统却是无可置疑的,至少在理论上是尊崇礼乐教化、德主刑辅的儒家思想。

儒家所谓礼乐,是人文化了的宗教礼乐,它不但包括祀礼祭神的郊庙礼乐,也包括日常生活的一切礼仪,是等级制度及其人伦规范的具体体现。而作为国家祀典的郊庙礼乐是大一统宗教与大一统政治的标志,所以占有重要位置。汉初诸帝对于建立汉王朝大一统的宗教与礼乐制度未予充分重视,直到武帝尊儒学为正统,并广召天下方士儒生共议郊祀、明堂、封禅之礼,又设立乐府,以李延年为乐官,命司马相如等作诗颂,才建立起大汉王朝的统一的宗教与礼乐制度,祀祖祭神的郊庙祀典最终才告完备。

儒家主张“尊王”,主张“大一统”,表现在郊庙祀典上即是崇祀至尊神上帝,而且只有天子才享有郊祀上帝的特权。汉初祭五帝,五帝并尊,统一的至尊神尚未形成。董仲舒提出了“尊天”的

观念,天至高无上,“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4]，“道之大原出于天”^[5]。天是有意志的主宰,是至尊之神,所以他主张“王者祭天”,而不是祭五帝:

天者,天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以最尊天之故,故易始岁更纪,即以其初郊。郊必以正月上辛者,言以最尊首一岁之事,每更纪者以郊,郊祭首之,先贤之义,尊天之道也。^[6]

古者天子之礼,莫重于郊,郊常以正月上辛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礼:三年丧,不祭其先,而不敢废郊,郊重于宗庙,天尊于人也。^[7]

郊天重于宗庙之祭,这不但是因为天于百神之中最尊,也因为郊天是天子特权的象征,具有宗教与政治的双重意义,宗教上的“尊天”扩展到政治上即是“尊王”。董仲舒又说:

《春秋》之义,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诸山川不在封内不祭,有天子在,诸侯不得专地,不得专封,不得专执。天子之大夫不得舞天子之乐,不得致天子之赋,不得适天子之贵。^[8]

董仲舒这种“尊天”的理论,与汉武帝的郊祀活动正相呼应。据《史记·封禅书》,亳人缪忌奏祠太一方,说:“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东南郊,用太牢,为坛开八通之鬼道。”于是武帝令太保立其祠于长安东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后又有人建言:“五帝,太一佐也,宜立太一而上亲郊之。”于是武帝令立泰畤于甘泉,“五帝坛环居其下,各如其方”。而且武帝始亲郊太一,其赞飨之辞谓:“天始以宝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终而复始,皇帝敬拜见焉。”自此以后,天子三年一郊见甘泉泰畤基本上成为定制。

显然,太一被尊为汉代大一统宗教的至尊神,相当于西周祀典中的昊天上帝,而五帝则降格为“太一佐”。秦代的宗教圣地是雍五畤,汉初诸帝因之。至此宗教圣地移向了甘泉,武帝又于此“作甘泉宫,中为台室,画天地、太一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9]。据《三辅黄图》:“甘泉宫一曰云阳宫,秦所造,在今池阳县,面故甘泉山,宫以山为名,汉武帝建元中增广之,周十九里,去长安三百里,望见长安城,黄帝以来圜丘祭天处。”^[10]太一至尊神的出现,标志着汉王朝大一统宗教的正式形成,也是大一统政治皇权至尊的体现。

太一之神并非来自秦代的祀典,而是楚国宗教中的至尊神。宋玉《高唐赋》:“进纯牺,祷旋室,醮诸神,礼太一。”《楚辞·九歌》中的《东皇太一》即是祭祀这位大神的宗教乐歌。《史记·天官书》说:“中宫天极星,太一常居也。帝三星三公,或曰子属。后句四星,末大星正妃,余三星后宫之属也。”《正义》说:“泰一,天帝之别名也。”然而,太一原非天神,而是一形而上学之哲学范畴。在古语中,太是至高无极,所以初之又初称太初,始而又始称太始,极之又极称太极,古而又古称太古,上之又上称太上,尊之又尊称太尊,等等。一是绝对唯一的意思,表示混然不可分析之最高观念。太一合称,自然表示至高无上、唯一无二的意思。老子最早使用这一术语,来作为其哲学的最高范畴“道”的名称: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一。^[11]

“大一”即“太一”,即老子哲学中的最高范畴,也即是《易经》中所谓的“太极”,《系辞上》说: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孔颖达疏:“太极谓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即是太初,太一也。”太一又与天同义,《礼记·礼运》说:

夫礼,必本于天。

夫礼,必本于太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

这样一个至高无上的“太一”自然极易被先民神格化。《史记·始皇本纪》载秦博士言:“古有天皇,

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杨宽认为,此泰皇即太一,“太一本为形而上学之名辞,含本体一元之意,后乃展转变为一元主宰神”。又说:“秦汉人神话之以泰皇高于天地二皇,别为阴阳,创造天地,形成万物,盖由于太一生阴阳之宇宙论之神话化。”^[12]可见太一之神乃春秋以后出现的新的至尊神。

以太一为最高至尊神,始于楚国祀典。楚文化本与中原文化有不同的传统,楚为战国七雄之一,随着势力范围的扩大,它要建立一种超民族的宗教信仰,如秦建立以雍四畤为中心的宗教信仰一样,于是奉太一为至尊神。太一之祭本非楚国固有之宗教信仰。然而老子本楚人,太一虽非民族之神,但与楚文化多少有些关系,楚奉太一为尊神,称为“东皇太一”,这大约与楚位于东南方有关。又据童书业说:“东方于五行属木,四时中属春,行次皆最先,所谓‘帝出于震’,在五行说支配下之宗教,东皇太一焉得不成天神中最尊贵者?”^[13]据姜亮夫说:“以《周礼》按之,则正南郊午位去国一里许,依泰坛以祭祀昊天,即圜丘之际也。圜丘所祭之昊天,天之总神也,其神为太一,居天之午。昊天为生物之始,故于神为最贵。”^[14]楚之祀东皇太一,以此为其宗教的信仰中心,无疑反映了楚国欲王天下的雄心。汉武帝重建太一之祀,一方面固然出于方士鼓吹,但另一方面也同楚文化与汉文化的亲缘关系有关。汉高祖起于沛,沛本楚国故地,所以他对楚文化是有特殊感情的。《汉书·礼乐志》说:“凡乐,乐其所生,礼不忘本。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皆楚声也。”《房中乐》是宗庙之乐,是汉初最重要的宗教乐章,采用楚声;我们还可以证明,汉武帝祭祀太一及天地诸神的宗教之乐《郊祀歌》也多为楚声,其体式也多仿《楚辞》,可见楚文化对汉王朝宗教文化的影响之深。汉武帝之尊太一,绝非偶然的选择,而是由楚汉之间相承的文化传统决定的。否则,他就应当选择儒家经典中的西周宗教的“昊天上帝”作为至尊之神了。祀太一,标志着与周秦传统宗教不同的汉家大一统宗教终于建立了。

建立太一之祠后,武帝又于河东汾阴立后土之祠,以成天地对应之格局。据《汉书·郊祀志》记载,元鼎四年,武帝亲行郊礼,说:“今上帝朕亲郊,而后土无祀,则礼不答也。”祠官建议:“天地牲,角茧栗。今陛下亲祠后土,后土宜于泽中圜丘为五坛,坛一黄犊太牢具,已祠尽瘞,而从祠衣上黄。”于是武帝立后土祠于河东汾阴,“上亲望拜,如上帝礼”。《汉旧仪》:“祭地河东汾阴后土宫。宫曲入河,古之祭地泽中方丘也,礼仪如祭天。”^[15]汾阴后土祠与甘泉泰畤的建立,取代了西周祀典中的昊天上帝与社稷之祭,构成了新的天地神祇对位格局。《汉书·礼乐志》说:“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社稷作为地祇之首的地位被后土取代。汉初虽已立有社稷之祠,但并不受到皇帝亲祭。在汉代新的宗教祀典中,所有的天神、地祇、人鬼都按照上下尊卑的等次重新排位:太一为至尊神,居天神之首,五帝次之,日月星辰等皆为从祀之神;后土居地祇之首,社稷及山林川泽之祇为从祀诸神;高祖居已故先帝之首,郊祀以高祖配天。《史记·封禅书》总述武帝所建汉家祀典说:

今天子所兴祠,太一,后土,三年亲郊祠,建汉家封禅,五年一修封,薄忌太一及三一,冥羊、马行、赤星,五,宽舒之祠官以岁时致礼。凡六祠,皆太祝领之。至如八神诸神,明年,凡山川名祠,行过则祠,行去则已。方士所兴祠,各自主,其人终则已,祠官不主。他祠皆如其故。

加上宗庙之祭,就构成了汉王朝大一统宗教祀典的全部内容。

除此而外,武帝又根据儒生与方士的建议,仿古天子之制,于泰山下建立了明堂,以祭上帝祖宗,朝诸侯,颁教化。明堂本是古代宗教、政治、教育的中心所在,儒家将其作为王权与礼乐教化的一个象征。《礼记·明堂位》说周公“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这些都是儒

家称颂的盛举。文帝时,贾山即建言“以夏二月定明堂,造太学,修先王之道”^[16]。武帝即位之初,即遣使者“安车蒲轮,束帛加璧,征鲁申公……议明堂事”^[17],赵绾王臧等儒臣也“欲议立古明堂城南,以朝诸侯”,因窦太后好黄老之学,不好儒术,事未就而罢^[18]。直到元封二年,武帝登封泰山完成了封禅大典后,才“作明堂于泰山下”^[19]。不过,汉武帝所建明堂是依据方士公玉带所上“黄帝时明堂图”,据《汉书·郊祀志》说:

初,天子封泰山,泰山东北址,古时有明堂处,处险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晓其制度。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明堂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水圜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名曰昆仑,天子从之入,以拜祀上帝焉。于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带图。及是岁修封,则祠泰一,五帝于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对之。祠后土于下房,以二十太牢,从昆仑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礼。

显然,公玉带所上明堂图不可能是黄帝时的,而是神仙方士的创作。武帝虽然为一代雄才,与秦始皇一样,却幻想长生不死,或登天成仙。传说黄帝曾乘龙上天,武帝羡慕不已,说:“嗟呼!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屣耳。”^[20]方士迎合武帝此种心理,“以黄帝有登仙之说,又有仙人好楼居之说,遂附会穿凿,造为此图”^[21]。与儒家经典所言明堂制度是不相符合的。

封禅是古代天子登封泰山,“告太平于天,报群神之功”的大典。秦始皇曾封禅泰山,刻石纪功,以颂秦德。汉兴以后,文帝曾“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中作《王制》,谋议巡狩封禅事”^[22]:

天子五年一巡狩,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命市纳贾,以观民之所好恶,志淫好辟,命典礼考时月定日,同律、礼乐、制度、衣服,正之……

这套巡狩封禅之礼是从《尚书·舜典》中照搬过来的,不过文帝也未及施行。至武帝即位,汉兴已六十年,“天下艾安,缙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23]。然而封禅乃旷世盛典,不可贸然行之。汉王朝又经过武帝时期的发展,文治武功达到了极盛时期,于是在元鼎年前后,出现了鼓吹“建汉家封禅”以成一代之典的热潮。司马相如临终前也留下了《封禅文》说:“陛下仁育群生,义征不慝,诸夏乐贡,自蛮执贽,德牟往初,功无与二。休烈液洽,符瑞众变,期应绍至,不特独见。”意思是说以当今天子的文治武功而行封禅大典已是当之无愧了,所以他建议汉武帝“修礼地祇,谒款天神,勒功中岳,以章至尊,舒盛德,发号荣。受厚福,以浸黎民”^[24],成一代大典。一帮神仙方士也加入了这一热潮。公孙卿说:“封禅七十二王,唯黄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汉帝亦当上封,上封则能仙登天矣’”。丁公也说:“封禅者,古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无风雨,遂上封矣”。幻想成仙登天的武帝似乎被说动了,于是召集群儒来议定其礼。《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古封禅群祀》二十二篇,《封禅议对》十九篇,《汉封禅群祀》三十六篇,就是他们讨论封禅礼仪的文字。然而,封禅“用希旷绝,莫知其仪礼”,“群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禅事,又拘于《诗》、《书》古文而不敢骋”。祠官倪宽建言:“唯圣主所由,制定其当,非群臣之所能列。”于是武帝自制封禅礼仪,“颇采儒术以文之”。因为武帝之急于登封泰山,除了欲“建汉家封禅”而成一代大典外,还有“欲仿黄帝以接神人蓬莱,高世比德于九皇”的私愿,所以他要用儒术来文饰其自定的宗教礼仪,以使其表面上符合封禅古义^[25]。

元鼎六年四月,武帝终于带着文武朝臣登封泰山,举行了汉王朝建立以来的首次封禅大典,并下诏改年号为“元封”。封禅泰山,自然是当时举国关注的重大事件。司马谈因故“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临终前对其子司马迁道出了终生憾事:“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26]可见武帝“建汉家封禅”在当时士大夫心目中的神圣意义。自此而后,武帝又于元封五年,太初三年,天汉三年,太始四年,征和四年,每隔五年一修封。封禅大典

的举行，标志着大汉王朝的统治的达到鼎盛时期。

汉武帝尊儒学为正统，制礼作乐，建立了儒学化的大一统宗教与礼乐制度，于是以改秦正朔、易其服色、更其制度为目的改德运动又勃然复兴。元封七年，司马迁等人再次提出“历纪废坏，宜改正朔”的建议，倪宽与诸博士也建言：“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于天也。创业变改，制不相复，……唯陛下发圣德，宣考天地四时之极，则顺阴阳以定大明之制，为万世则。”^[27]太初元年，武帝正式宣布，汉继周后，当为土德，以夏历正月为岁首，色上黄，数用五，定官名，协音律^[28]。始倡于贾谊的改德改制运动终于在汉兴百余年之后完成，这意味着汉代统治者为其新的大一统宗教与礼乐制度在五德终始之运中正式确立了其宗教神学的依据，结束了汉袭秦礼的历史，形成了儒学化的宗教与礼乐文化的传统。

注释：

[1]《汉书·武帝纪赞》。

[2]《汉书·武帝纪》。

[3]《汉书·元帝纪》。

[4]《春秋繁露·五行相生》。

[5]《汉书·董仲舒传》。

[6]《春秋繁露·郊议》。

[7]《春秋繁露·郊事对》。

[8]《春秋繁露·王道》。

[9][20]《汉书·郊祀志》。

[10]转引自秦蕙田《五礼通考》卷六。

[11]《老子》第二十五章，“大一”原文作“大”，据郭沫若说补。又据《庄子·天下》：“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吕氏春秋·大乐》：“道也者……不可为名，强为之谓之太一。”可证此章“大”本应为“大一”即“太一”。

[12]《中国上古史导论》，《古史辨》七（上），第178～179页。

[13]《三皇考序》，《古史辨》七（中），第25页。

[14]《楚辞学论文集》第300页。

[15]《文献通考·郊社考》引。

[16]《汉书·贾山传》。

[17][18]《史记·儒林列传》。

[19][22][23][25][28]《史记·封禅书》。

[21]《五礼通考》卷二十五。

[26]《史记·太史公自序》。

[27]《汉书·律历志》。